东方论坛 2012年第3期

潘耒史学思想探源

吴 超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上海 201620)

摘要:清初潘耒以"史才"鹤立于词科。其求学与成才之路固然受到家学传统之影响,但论及师承关系,潘氏乃集众家史学之长于一身。其师如顾炎武、徐枋、戴笠诸辈之治学偏重不同,皆对潘氏影响至深。但由于时代变迁,潘氏所处的社会地位发生剧烈变化,导致其史学精神出现了"变调"。

关键词:潘耒;史学思想;徐枋;戴笠;潘柽章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12)03-0013-05

潘耒(1646—1708),出身于书香门第,世居江苏吴江之平望。其曾祖父潘志伊为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仕终广西布政司右参政;祖父潘锡祚以贡生为湖广布政司理问。父潘凯(1606—1651),字仲和,号贻令,门人私谥为"贞靖先生"。凯少有才名,补邑诸生,因母忧而未出仕,布衣终身。其生平好交友,勤学不辍,"诗文典实、详雅而尤工笔札",且负"经世之志";遭甲申之变后,隐居乡间,故旧均目之为"端人君子"。[1](P692)凯有三子,长子潘柽章,次子潘长适,幼子潘耒。三人中,柽章以史学闻世;而潘耒原名栋吴,康熙年间被荐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日起居注官,亦能光显门庭。

潘氏家族学优而仕、经史传家的家学传统对潘 耒影响至深。他曾略带自豪地追忆其父主持复社 之往事"明万历中,高忠宪公与顾泾阳先生讲学锡 山,海内正人翕然宗之,有东林之目。熹宗朝为阉 党摧残略尽,崇祯中又有所谓复社者,实东林之徒 为之……一时豪俊英伟之士多在其中""复社创自 吾邑,娄东首与相应和。其时,先府君(指潘凯)与 沈介轩、吴扶九两先生实主持其事。三君之家,名 贤辐辏,倾盖班荆,文酒之宴无虚日,里人至今能道 之"。[2](P544)潘耒不仅在感情上亲近复社,同时也认 可东林务实之学风。因此,他将保存东林、复社之史实视为己任:今国家纂修《明史》,耒适在载笔之列,窃见天启、崇祯朝国史残缺而稗官野乘记载杂出,往往失真。东林、复社之事关系兴亡,亦无能道其始末者。"^{[2](P545)}

不过,虽然潘耒家学渊源深厚,但言及师承关系,他并没有从父兄处得到太多点拨。潘凯去世时, 耒方六岁;而柽章卒时,耒未及弱冠。故潘耒的求学与成才之路多赖其师如顾炎武、徐枋、戴笠诸辈之力。

1 诸师治学偏重不同皆对潘耒有所影响;然至深至久者,首推顾炎武。潘耒极为尊崇亭林之学,云:先生负名世之资,学贯天人……邃于经术而又洞悉当世之故",著书上自经籍、图史、方舆、音律,下至名物、器数,元元本本,至精至悉,有功后学不在康成下,而浩博闳深有过于今日所传文中子之书。"[3] (P541) 这里,康成"指遍注群经的东汉郑玄,而"文中子"乃续疏六经的隋代王通。潘耒将亭林比附此二人,实则是把"顾学"定性为一种回归汉唐注疏形式的复古之学。这种见解充分表明"顾学"之内涵确实具有某些"汉学"的因子。但潘耒也清醒地认识到,亭林之学问早已超出汉唐古学的

收稿日期:2012-03-09

基金项目:本文受到2012年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文科科研启动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吴超(1984-),男,上海人,历史学博士,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国近

现代史等。

范畴,其外延之广远非"汉学"所能囊括。实际上,以"顾学"为代表的清初学术主要是以"实学"为其特点。这种治学风格不仅在亭林身上有所体现,潘耒的其余师长亦均有所秉持。他说"自先兄力田而外,若先师戴耘野、吴赤溟及徐介白、张文通、王寅旭辈,皆以实学、真品著闻。"而所谓"实学"是指"自天文、地理、历术、算数、水利、农田,以至经脉、药石、卜筮、占候"等"有用之学"。^{[4](P467)}这些学问与"汉学"有着天壤之别,且带有浓厚的经世意味。在亭林诸辈的实学学风的影响下,潘耒也认为"古之君子不为无用之学,六艺次乎德行,皆实学,足以经世者也。"^{[5](P491)}

然而"顾学"虽不同于汉唐之学,但仍与清初以降学术界兴起的"汉学"潮流一脉相承,其主要原因还在于两者皆以经史为根本。亭林曾指出"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后邪说以起。不知舍经学则其所谓理学者,禅学也。"^{[6] (P390)}他在清算理学之余,将"经学"作为衔接清代与汉唐学术的桥梁,从而跳跃了宋明理学与心学这段儒学发展时期。此举亦促使经史之学在清初复为昌明。潘耒受其影响,亦强调学问必本于经、史,曰"时文俗学之陋,破坏天下人材百年。……董正师儒申明条约,汰除坊刻之文,禁绝剿袭熟烂之体,经之以经,纬之以史,驱天下而为通经学古,明体达用之士,世道其有赖乎!"[7] (P532)

亭林尝视史学为经世之学。《日知录》卷十六 《史学》有云:史学"劝善惩恶 亚于六经";其进取 之得失,守御之当否,筹策之疏密,区处兵民之方, 形势成败之迹,惮加讨究,有补国家"。[8](P744)潘耒 师从亭林,于史学亦大有精进。以金石学为例,潘氏 继承其师以金石碑刻与文献典籍互证的治学方法, 指出"古金石刻不独文词之典雅,字画之工妙为可 爱玩, 而先贤事迹、前代制度不详于史者, 往往著见 焉。"[9](P578)他还明言道:未少学于顾宁人先生。先 生实甚好古 行游天下 见闻浩博 著《金石文字记》 一书,最为精核。 耒心慕焉, 年来足迹所至, 残碑断 碣靡不搜访,披榛剔苔,必榻一纸而后已。"[10](P497) 此外,亭林史学尚涉及典故、制度、地理、风俗等众 多方面 潘耒披其学而能有所发明 不隳师道。清兴 之时,吴中大儒因守遗民气节皆不仕新朝,而以私 学传道为能事。潘氏生于此间 遂得诸位良师悉心 授业以成大器。古之善学者得一良师足矣 而其集 众家史学之长于一身,又何其幸哉!《清史稿》尝 表彰潘氏"史才"与朱彝尊、汪琬、吴任臣并称 盖鹤 立于词科同辈也。[11](P13344)

2 除亭林外,以下分叙潘耒其余师长,并略析各家史学对其影响:

(1)徐枋(1622-1694),字昭法,号俟斋,江苏 长洲(今苏州)人。潘耒作《徐俟斋先生七十寿序》 褒奖其学识、品格、云"先生学醇而德完、外介而中 和 坦夷粹白 浩浩然 落落然 清而容物。未尝以 己律人 刻厉之行不存乎躬 矫激之言不出乎口 学 识冠世而不轻臧否人物,文章言语妙天下而寸长一 善、奖赏如弗及。 行高当世而勤求寡过 , 誉满天下 而恒耻过情。"[12](P550)徐氏生逢甲申国变,誓不从 清乃遁迹山林。潘耒曾编校其师所撰《居易堂集》, 对于徐氏的故国情怀深有感触 因此称其"避世而 未能忘世"。徐氏在文集自序中有过一段肺腑之言: "余不佞痛遭家国之变……死志未遂,苟存于时。 于是束身土室,与世诀绝。时即碌碌苟安,无所龃 齬 而伤心之悲 终天之痛 惨灼酷烈。鲜民之生不 如死之久矣 而况世变至今四十年中 崩天之敌 稽 天之波 弥天之网 靡所不加 靡所不遘;而再益之 以饥寒之凛慄,风雨之飘摇,世事之诖误,骨肉之崎 岖 靡所不更 靡所不极。呜呼 亦可痛矣!"[13](P3) 徐氏虽身处江湖之遥,有"避世"之行,然胸怀前朝, 不能超脱,此耒所谓"未能忘世"也。他这种寄情 山水、不同流俗的做法,后来也为官场失意的潘耒 所效法。

据《徐俟斋先生年谱》载 潘耒自十八岁起"以 诗请业 ,遂从游于门 " 終身不弃。[14] (P415)徐氏素知 潘耒家世,尝感叹道: 古来贤才奇节之士,大都死 生契阔 颠沛流离 家道坎坷 身婴沉疴 其所遭遇, 必极人世之所不能堪,有不可一朝居者"。[13](P51)并 因此时常勉励其曰"足下既抱不世出之奇才 擅穷 人益工之绝艺 ,而天复以忧患坎坷玉汝于成 ,则天 之所以与足下者甚厚,而足下其可轻用其才而轻视 其所遭乎?忧患以动其心,穷愁以坚其骨,而益静 其居处,简其出入,严其师友,收敛其才华,克拓其 器识;藏其锋以需大试,养其气以期大成,则异日 所成就,又岂古今一才人能尽足下哉?"[13](P52)潘 耒感于徐氏之高节,遂虚心求教,斩获良多。与其 同学于徐氏者尚有吴派学术之先导惠周惕(1641— 1697),两人定交于康熙六年(1667)。惠氏曾回忆 当初与潘耒一道求学时师徒共乐之场景"予之来 京师也,搜集(徐枋)先生手书,装之与俱。往往秋 风独夜 篝灯披览 若历历见先生于宜桥竹树之旁, 与先君子对坐谈笑,且见次耕(潘耒字),超士(吴榷 字)执简操笔以进,而予兄弟亦若揖让进退于其左 右之间 不觉衋然涕泗之横集也。"[15](P474)

徐枋以史学见长,潘耒从学甚笃,颇得其真传。 徐氏有《读史稗语》十一卷,内容"上自五帝,下至 宋元",乃"搜历代正史","不移寒暑",伏读而成。 其编撰之动机在于"摘古人之行事,窃志微辞,或 探义类之玄赜"。[13](P146)因此,该书寓含着徐氏史 学之精华 其核心思想亦为潘耒所继承。徐书卷一 之首条即以"米价"为始、曰"王者以民为天、民以 食为天, 故米价之贵贱足以征其时之治乱也。"[16] (P273)此为徐氏关注民生 重视社会经济与政治联系 的史学思想之体现。而这一点也促使潘耒在后来 的历史研究中格外注意传统的"食货"之学。他在 《上某总裁书》中提到"窃惟史莫难于志,志莫难 于食货""作志必先采料,木石具而后可以筑室, 缣素具而后可以缝衣。故将明代《实录》通纂一过, 凡片言只字有关于食货者 悉行节出 琐细庞杂不 厌其详,盖欲使一代物力、登耗、度支、盈绌之故了 然于胸中,而后可以下笔也。"[17](P448)当然,潘耒也 正是凭借这方面的史学先见及才能,才被授以史馆 纂修《食货志》之职。不过由于时代变迁,徐枋史 学中某些包含民族对立的思想因素在新朝眼中已 成为禁忌 业已仕清的潘耒自然不敢跨越雷池。如 徐书"民心"一条有云"民心戴正统而恶乱贼,内 中国而外夷狄,千古所同也。贵在能因人心而用之 耳。"[16](P291)而在潘耒著作中则绝不敢提及所谓满 汉、夷夏之说,甚至内心中已将满人视为中原之主。 此事若为其师所晓见,诚亦扼腕也。

(2) 戴笠(1641—1682),字耘野,江苏吴江人。《戴耘野先生六十寿序》云"耒燥发即执经于先生凡四年,而后从吴愧庵先生游又弥年,而后从先兄受书。吴先生与先兄之志节,犹先生之志节也。"[18](P542)戴笠与顾炎武、吴炎、潘柽章系生死之交,故潘耒对其不仅有师徒之谊,更有亲人之情。戴氏素以精通明史掌故而闻名,潘氏在明史方面的知识积累与许多观点均袭自彼处。

"南明"史乃触犯兴朝大忌的敏感话题,故有志于南明史实编纂的清初史家,其遗民思想往往较重,戴笠即其一也。其《行在阳秋》一书以编年体的形式记叙永历一朝之事,其文虽简略,但考据详实,可为信史。^[19] 值得一提的是,戴氏好友顾炎武亦曾从事于南明史迹的整理,所撰《明季三朝野史》四卷就编撰体例及内容而言,与戴书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受师辈之影响,潘耒在参与《明史》编撰时也向朝廷提出过应重视南明史料搜集的建议:"若珰祸之终始,金陵、闽、粤破亡之本末,皆茫无所考,非下求书之令,除忌讳之条,悉访民间记载,与

夫奏议志状之流 上之史馆不可也。"^{[20](P441)}

潘耒云: 国不可以无史, 史不可以难而弗为 "。 为了完成一部良史,他指出:史馆应做到"搜采欲 博 考证欲精 职任欲分 义例欲一 秉笔欲直 持论 欲平,岁月欲宽,卷帙欲简"。[20](P441)换言之,由一 人成史已不再可能 众史家应在统一的编纂标准下 各依所长 分别撰述 最终汇合为一。潘耒这种"职 有专司","畛域既分"的修史思想之形成可能与潘 柽章、戴笠尝欲合修明史的事件有关。 他在《 寇事 编年 序》中提到: 亡兄有意编纂明代之书 先师戴 耘野先生为之分任寇事。崇祯一朝无实录 取十七 年之邸报与名臣章奏、私家记载,采辑成书。 用编 年体排日系事,不漏纤毫,依司马温公先丛目,次长 编,后通鉴之法,宁详毋略,宁琐毋遗,提纲缀目, 有条有理,自延绥起事,迄西山余党之灭,凡十八 卷。"[21](P464) 戴笠在这部编年史中,充分表露出以 朱明为正统的遗民思想。他痛诋农民军为"妖孽"、 "贼寇"怒斥"献贼"、"闯贼"为"狂虐"、"残暴","以 假仁义收人心"[22](P8)并进一步追思明亡之原因认 为"去河北贼易,去中朝朋党难。痼疾成者不可疗, 木心蠹者不可扶,岂非百世之炯鉴哉!"[21](P464)

但对于戴笠这份特殊的故国情结,潘耒认识得并不深刻。逃禅后之戴氏曾倾注三十余年心血,怀铅握槧,博访旁询"^{[21](P465)}編成《殉国汇编》一书。其书之旨原为哀思崇祯有德而亡国 表彰社稷之臣能殉国而尽忠。顾炎武听闻此书,深明戴氏之用意,曾以"道远无从批读"为恨。^{[23](P140)}不过潘耒对此却有另一番理解,他认为"兴朝宽大,不罪忠于所事之人"故"先生此编无嫌无忌,及今流通于世,以备史家采择,以为臣子劝忠可也"。^{[21](P466)}这里,潘耒将表彰明臣气节之书用作新朝劝忠之资,显然已完全背离戴笠之初衷。由此可见,戴、潘师徒修史之立场已截然不同。

(3)潘柽章(1626—1663),字圣木,号力田; 吴炎(1624—1663),字赤溟,号悔庵,俱为江苏吴 江人。二人垂名青史,乃因罹难于"明史案"之故。 据《研堂见闻杂记》载:

明史之狱,发难于吴之庸。后攀染无数,凡藏书者与著者一体同罪,严旨逮捕。吴江有两生,一为潘柽章、一为吴炎,平日闭门读书,亦私著"明史"一部,藏之家,未及梓。庄允成以其同心也,列之参评。后按籍擒捕,两县令、一司理登门亲缉(两生)一则方巾大袖以迎,一则儒巾褴衫以迎,辞气慷慨。凡子女妻妾,

一一呼出,尽以付之。两县令、一司理谓"君家少子姑藏匿,何必为破卵。"两生曰"吾一门已登鬼箓,岂望覆巢完卵耶!"悉就械,而挺身至杭就讯。既见两部官,痛骂不屈;夹二棍,骂益甚,两部官蹴其齿尽落。闻两生于我朝定鼎之后,闭关不与人通,一以著书为事……其慷慨以妻子尽出者,岂真铁石心肠哉!一腔热血,有难言者存矣。[24] (P59)

潘、吴二人身正为史,不惧斧钺,其节义足为吴中之楷模。其好友顾炎武晚年也回忆道:每南望乡关,屈指松陵(即潘柽章)数君子……音仪虽阔,志向靡移……不禁其感涕矣!"[23](P140)经历此事,潘耒劫后余生,曾一度从其师徐枋,避居乡野,并改名"吴开奇"。因碍于文网之严苛,他一生并没有为柽章立过传。不过,他全力搜访其兄遗书并为之编校,意在传其学而志其人。柽章崇尚实学,甚至精通"天特、人事、兵机、物数之占",且"留意三式之学,于六壬尤多悟入","尝谓当世所尚大约有三:或专论课体而失之拘,或专贵类神而失之粗,或杂取神煞而失之支,皆不可以为法",故撰有《壬林》一书,能"溯流而穷源",明百家之占法。[25](P460)

然柽章所擅诸学仍以史学为其大要。潘耒肆 力编辑兄长所撰史著 除悉心研读之外 更对柽章 的编纂动机与史学思想有所体获。其《 松陵文献 序》云"亡兄与吴先生草创明史 先作长编 聚一代 之书而分划之 或以事类 或以人类 条分件系 汇 群言而骈列之。异同自出 参伍钩稽 归于至当 然 后笔之于书,其详且慎,如此庶几不失古人著书之 意。"所以"因此书以想亡兄史书之大略,与结撰 之苦心,则虽不传犹传也"。[26](P481)柽章对于修撰 明史的执着以及对"国可亡,史不可亡"史家传统 的亲身践履,皆使潘耒为之动容。潘耒为《国史考 异》作序道"明有天下三百年而史无成书……亡兄 力田以著作之才 盛年隐居 潜心史事 与吴赤溟先 生……博访有明一代之书,以实录为纲续, 若志乘, 若文集,若墓铭家传,凡有关史事者,一切抄撮荟 萃 以类相从 稽其异同 核其虚实 积十余年 数易 手稿而成。"[27](P463)

柽章史学以考实、稽古为核心,其中所包含的史家"求真"之义对于后继者潘耒而言,是一笔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潘耒指出"作史犹治狱也……作史者一事不核其实,则溢美溢恶,而万世无信史。"因此在对待史料时,应先甄别伪谬,然后"参之以记载,揆之以情理,钩稽以穷其隐,尽

一以求其当;去取出入皆有明征,不狥单辞,不逞 臆见,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如此方能保留客观的 史实。[27](P463)有时史料的庞杂会混淆史家之判断, 潘耒举明代野史为例,说"至明而无人不有札记, 其见存者无虑千百家,专纪时事者尚三四百种,可 谓多矣。然体亦滋杂 类多荒诞不根 鄙俚舛错可 稗正史供采掇者,十不得一二。其病原于世之文 士速求名而好著书,不得之目见耳闻,影响传说辄 著于篇 取增卷帙、谈资而已 乱事实而误正史 不 厌计也。"[28](P475)史家面对这种情况,应当恪守史 责 持论公允。他在上史馆《修 明史 议》中说: "史家大端在善善恶恶,所谓诛奸谀于既死,发潜 德之幽光者,其权至重。"[20](P441)故《明史》所涉 及"真小人不容借贷,而伪君子亦不当包容。若 忠臣、烈士 抗节致命者 宜如文天祥、谢枋得之例 大书特书,以劝忠义.....至于议礼之得失,夺门之 功罪,从亡之疑信;康斋、白沙、阳明之学术,茶 陵、江陵、太仓之相业,论者互有同异,或激扬过 当 或刻覈失中 ,惟虚心斟酌 ,勿主一说 ,而后是非 可定。"[20](P442)在史学一途,潘耒秉持其兄遗志, 尝以修《汉书》的"班氏一门"与撰《梁》、《陈》书 的"姚氏两氏"[27](P463)自比其家族。其目的即在干 激励自身莫忘修《明史》之使命与重责。

修《明史》固潘柽章、吴炎之夙愿。二人合作的明史著作有很多《今乐府》亦其中之一也。此书虽名为诗词集,但其旨在于以诗存史。柽章为之作序,称其与吴氏尝欲编《明史记》然"草创且半,或谓余两人固无徇名失实之病,然所褒贬多王侯将相有权力者,且草创之始,见闻多隘,子其慎诸!两人谢不敢。私念是书义例出入,必欲法之当今,取信来世,故不得已而托之于诗,则《今乐府》所为作矣。"[29](P12)诗集中所咏人物、事迹皆依正史本纪、世家、传记之体例编排,可谓名副其实之"诗史"其著述微旨皆怀有私修明史、不忘故国之意。

潘耒也曾为《今乐府》作过序,但由于该书成于明清易代之际,其中言辞激烈,屡犯时忌,为清廷所查禁。因此,他只能将此序文从《遂初堂集》中撤出。潘、吴两家累世修好,潘耒《祭吴东里先生文》云"(东里)先生(指吴炎之父)与先考(指潘凯),亡兄厚善,耒复执经于先生从子愧庵先生(指吴炎),通门世好,往还无间"。[30](P36)

3 总言之 潘耒集聚了清初诸大儒的学术精华 与治学特点 而他凭借自己的刻苦与聪慧也确实在 史学一途闯出了广阔的天地。然而由于时代的变迁, 潘耒所处的社会地位发生剧烈变化。从史祸之受害 者一跃而为兴朝之御用"新宠"这种生活与心理的落差逐渐导致潘耒乃至潘氏家族的史学精神出现了"变调"。潘耒面对师辈的陆续辞世,内心不免泛起某些迷茫与忏悔,他曾提到"耒既濡足世途(吴东里)先生不以余为不肖 辱进而教之。……比先生疾革,传语欲见余,及余造榻前,先生形神已离,犹披衣起坐,拱手向余云:忍死待君者。三竟不复言,遂于是目瞑。呜呼,痛哉!"^{[30](P36)}面对师辈的期望与往日的教导,业已仕清的潘耒顿时有"出处无成,进退失据"之感:尽管身怀史才,但论史家之风骨,又难与顾、徐、戴、吴诸师相提并论;官场失意后亦曾避世于故里。逃禅于方外,然论其"未能忘世"之心,则又与师辈迥异矣。作为"顾学"嫡传的潘耒之学,其承者虽得于众师,而其变又岂奈何于时乎?

参考文献:

- [1] 潘耒.先考赠征仕郎翰林院检讨仲和府君行述[J].遂初堂文集 [M].(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41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2] 沈介轩八十寿序[A].遂初堂文集[M].
- [3] 顾亭林先生六十寿序[A].遂初堂文集[M].
- [4] 《格轩遗书》序[A].遂初堂文集[M].
- [5] 《方程论》序[A].遂初堂文集[M].
- [6] 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续修四库全书本,第553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7] 送田纶霞水部督学江南序[A].遂初堂文集[M].
- [8]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M].石家庄: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
- [9] 书《金石文字记》后[A].遂初堂文集[M].
- [10] 《昭陵石迹考》序[A].遂初堂文集[M].

- [11] 赵尔巽主编,缪荃孙、柯劭忞等纂.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98.
- [12] 徐俟斋先生七十寿序[A].遂初堂文集[M].
- [13] 徐枋.居易堂集(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404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14] 罗振玉.徐俟斋先生年谱[M].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57册)[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9.
- [15] 李开.惠栋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 [16] 徐枋.读史稗语[M].四库未收书辑刊编纂委员会编.四库未收书辑刊(第3辑第28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17] 上某总裁书[J].遂初堂文集[M].
- [18] 戴耘野先生六十寿序[J].遂初堂文集[M].
- [19] 戴笠.行在阳秋[M].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文献史料丛刊 (第5辑第98册)[M].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4.
- [20] 修《明史》议[A].遂初堂文集[M].
- [21] 《寇事编年》序[A].遂初堂文集[M].
- [22] 戴笠著,吴殳编定.怀陵流寇始终录[M].台北:广文书局, 1969.
- [23] 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 1985.
- [24] 佚名.研堂见闻杂记[M].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5辑第98册)[M].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4.
- [25] 与人书二[A].遂初堂文集[M].
- [26] 《松陵文献》序[A].遂初堂文集[M].
- [27] 《国史考异》序[A].遂初堂文集[M].
- [28] 《交山平寇本末》序[A].遂初堂文集[M].
- [29] 吴炎.今乐府[M].邓实.古学汇刊(第1辑第12册)[M].上海:国粹学报社,1912.
- [30] 祭吴东里先生文[A].遂初堂文集(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418 册)[M].

责任编辑:侯德彤

Research on the Source of Pan Lei 's Historical Thought

WU Chao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 Shanghai 201620, China)

Abstract: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Pan Lei was famous for his historical talent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of poetry. Although his study and growth were affected by the learning tradition of his family, Pan Lei gathered lots of historians 'characteristics by himself. His teachers such as Gu Yanwu, Xu Fang and Dai Li pursued different studies and influenced him greaty. However, Pan Lei 's historical spirit varied because the age and his social position changed radically.

Key words: Pan Lei; historical thought; Xu Fang; Dai Li; Pan Chengzhang